

1708

政协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2

应城文史资料

525

目 录

· 人 物 述 林 ·

- 刘仁静自述.....李建安 夏长林整理 (1)
-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期.....刘仁静 (11)
- 我的父亲郭仁泰.....郭绍文 (22)
- 洞商“忠、恕、元”的三后裔
- 抗日志士陈愚安.....朱业精 (41)
- 陈志远沦为汉奸前后.....李廷杰 (46)
- 我所知道的陈伯芳.....王之纓 (51)
- 蒋老七杀人目击记.....汪正德 樊作楨 (55)
- 蒋老七劣迹一二.....李楚桥 (58)

· 政 坛 琐 记 ·

- 袁浩然治下的县政府内幕.....李 韬 (63)
- 我三到应城两次图谋暴动的经过.....赵云丹 (72)

· 往 事 漫 忆 ·

- 忆汤池改进区与碾米榨油厂、织布厂
-聂炳南 刘连仁 罗伯臣 (83)

汤池碾米榨油厂二三事	李 韬 (95)
应城沦陷前后	王之纓 (101)
记日寇在陈河的一次大烧杀	陈纯清 (115)
留日琐记	张 峥 (120)

· 膏 盐 史 话 ·

湾上镇的石膏运销业	士心整理 (127)
膏洞、盐棚的管理情况	张正楷 (140)
反日伪“食盐封锁”中的同一公柴行	
.....	邹德均口述 艾 田整理 (151)
陈道生和同生膏矿	陈孟明 (160)

· 蒲 阳 百 业 ·

长江埠的白布街及白布业	
.....	笪冬生 刘济生 许顺娥 (169)
“王桥白布”史话	王槐松 (182)
应城银号暨合作金库	张光祖 (192)
我所知道的任大兴锅瓷铁号	王长清 (202)
享有盛誉的“四房馆”	
.....	陈文庭口述 程亚光整理 (211)

· 文 海 拾 贝 ·

应城民众教育馆纪实	
——小先生回忆录	杨永清 <u>李梓泉</u> 陈绍华 (218)

应城精诚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纪略.....	曹纪伦 (229)
汉剧在应城的轶闻.....	宋纯清 (236)

• 社 会 风 情 •

寿宁禅寺和城隍庙见闻.....	王之纛 宋纯清 (243)
“红堂”拾遗.....	徐子樵 孙砚田 (249)
文峰塔杂记.....	朱冠群 (257)

• 资 料 集 纳 •

沦陷前城关北正街的店铺、作坊	姚幼安 (261)
----------------------	-----------

刘仁静自述

李建安 夏长林记录整理

编者的话：刘仁静，曾用名有刘亦字、刘意人、刘敬云、子云、澄云、刘镜园等，湖北应城城关人，生于1902年3月。因车祸不幸于1987年8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逝世前为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一位谢世的中国共产“一大”代表。笔者曾于1983年5月赴京两访刘仁静，此文即根据他生前的口述整理而成。

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后

1902年3月，我出身于湖北省应城县城关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1914年春进武昌博文学院，两年后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附中，我认识了恽代英同学，并参加了以他为主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7月，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恽代英留校任教。我到北大后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我参加了北大组织的讲演团，上街向群众宣传中日签订“二十一条”的危害性，号召群众起来斗争。运动期间，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官方派一个姓胡的来任校长，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

仅少数学生拥护，反对派与拥护派之间展开激烈斗争。我因参与这一斗争，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由于我对物理不感兴趣，次年即转入哲学系。当时北大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的主要时间是花在读书馆里，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也读了考茨基、克鲁泡特金的一些书，从中接受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此间，我经王光祈的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过该会的会计。以后，又经王的介绍，去和胡适谈过一次话。记得，当时我对胡适说想看很多书，但他说我好高骛远，还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之后，我长时期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春，我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邓中夏、罗章龙介绍，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当时，我们北平小组只有七八个人，其中北大五六个人，清华一人，另一所大学一人，由于小组中几个有影响的如邓中夏、罗章龙有事在身，不能出席“一大”，所以，我和张国焘被选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一大”的代表。在去上海的途中，我还到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的大会。这个组织主要是四川人发起的，以后，他们内部出现共产主义思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尖锐斗争，不久就自行解散了。党的“一大”大约是7月23日在李汉俊家召开的，代表人数有些书刊上说12人，实际上是13人，因为广东的包

惠僧参加了会议。本来，陈独秀是应该参加的，但由于他当时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工作很忙，故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会议期间，有个人来敲门，看了一眼就走了，我们中间有人认出是侦探，于是马上烧毁了所有的文件。一会儿，警察就包围了会场，因没有搜出什么可疑之物，也就没有抓谁。为了安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我们便于次日分别去嘉兴，在南湖一条船上继续开会，直至闭幕。这次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周佛海为候补委员。会后，我在杭州的西湖又见到毛泽东。他对我说：“你要注重做实际工作。”毛给我的印象是，他很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

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同时，我还担任华俄通讯社翻译，把北京各报上的重要新闻译成英文，再由俄国人译成俄文发到莫斯科各报刊载，那时，每月可得薪水80元。1922年，我和邓中夏在北京又创办了《先驱》周刊，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我办了三期，在《先驱》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刘敬云。此刊以后交给了施存统主编。

这一时期，我曾回过一次老家——应城。当时，我订有一份英文版的《大陆报》，这份报纸是一个美国人办的，每天从上海直接寄到应城。我主要为了学英文才订《大陆报》。在应城，我接触的人不多，开始是住在湾上我小姑妈家里，她家是开包子馆的。以后，我因有个表妹嫁给应城北乡一个名叫曹春山的人，他们待我很好，邀我到那里去玩，

大约住了一个月。我曾在那一带农村作过一些调查，其结果，我认为农民的觉悟很低，不可能革命。于是，我在应城给恽代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农民封建、保守，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以后，我离开了家乡，经上海去了北京。

1922年9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找到我后，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派他去参加。还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派我为代表去苏联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铁路工会派王俊作代表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我们三人即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后到达莫斯科。我参加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住了一段时间，又和陈独秀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安排陈独秀发言，因他不会讲欧州国家语言，就推我代表他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报告。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大会闭幕后，我留在苏联学习了几个月的俄文，于1923年4月，和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同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去广州，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进团中央，并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我担任了几个月的总书记，就犯了错误，被上海团市委弹劾了。不久，我以去北京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也很有成绩。我到北京后，就主编《政治生活》，但只办了三期，就交给了别人。

在土耳其的日子里

1926年，党派我第二次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我到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到那里学习过。1928年6、7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托洛茨基的思想。本来，在共产国际“四大”时，苏联党内还没有什么矛盾，列宁逝世后，才出现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尖锐矛盾。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我当时不仅不相信苏联政府的宣传，而且同情他，接受了他的思想。当我向张国焘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时，张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可能从欧洲回国，而只能从西伯利亚回国。1929年4月，我在莫斯科学习两年多以后，获得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我绕道欧洲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也没有讲。我离开莫斯科后，经波兰、捷克到了德国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话，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此外，还参观过一些革命纪念圣地，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不到一个月，我就离开柏林，经罗马尼亚，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随后，去太子岛拜见了托洛茨基。他的住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门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他同我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一般，但他很高

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当时，他正忙于写自传，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夫人和大儿子。他夫人做家务事，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靠给报纸写文章，平时吃的是面包和菜汤，只能吃个半饱。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活动经费。他的工作很忙，一般在工作室写作。工作室里的陈设也很简单，桌上摆有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

我在土耳其，住在托洛茨基家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吃完早饭就到他家里去谈话，多半在他家吃午饭。我回国前夕，连下午都在那里交谈。我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活动，而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用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

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月后，于1929年7月离开那里，取道巴黎回国。临行前，托洛茨基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聂里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后来，我和他通讯时就用这个名字。

脱离革命之后

1929年8月16日，我从巴黎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知道了我私自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很恼火。首先是党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限我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作交代。党组织见我又不交代问题，就把我的党籍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也就脱离了革命。

我回国之前，中国已有了托派组织，参加的成员多数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1929年，先后成立过几个托派组织，有“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回国后，我开始进行组织托派的活动，和一些从“我们的话”里分裂出的留俄学生一起组织了“十月社”，办了个《十月》月刊，但只出过一期，另外还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1929年底，我将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托洛茨基。他回信说，应该把这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我又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告给上述几

个托派组织的负责人。大约在1931年，中国几个托派组织同意统一起来，由陈独秀负责，但没有统一的名称。我原来是属于“十月社”的，但“十月社”的多数人与我发生了冲突，说我是“议会迷”，把我开除了。所以，几个托派组织成立统一组织时，我哪一派都不是。我是站在他们之外的游离分子，但我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的信仰。托派组织统一后不久，由于国民党逮捕了一些人，就停顿了。

1931年“九·一八”前，陈独秀到我家，说要办一个刊物，我当即表示赞成。这个刊物的名称叫《热潮》周刊，办了十几期，由陈独秀、彭述之和我主编。1932年我与陈独秀失去联系，接着陈独秀就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刊物也就停办了。

1934年，我在上海与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有了联系，他是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的英文编辑。那时，我的工作很不安定，靠写稿为生，想找个固定工作。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因为他认识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在北京。于是，经格拿斯的介绍，我就带着家眷到了北京，跟伊罗生当翻译，每月的薪水80元。1935年，我替伊罗生把材料译完后，决定带家属回湖北应城。临走前，伊罗生告诉我说，不要带煽动性的东西，他们要搜查的。当我离开住所去火车站时，前后左右有很多自行车跟着我们。一到西站，他们就对我进行检查，发现我的行李中有一张打过英文的纸，就以此为由，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王府井关了起来。后来，又把我送到警察厅。他们要留俄学生认我的照片，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他们认为，象我这样的案子不能解决，就在1935年5月，把我送到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11月，南京警备司令

部对我进行军法会审，判了两年半徒刑，押送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里成立了“自治会”，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反省院院长指定我担任“自治会”主席。“自治会”主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同一些犯人散散步，放放风，有时组织些娱乐活动。我在苏州反省院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节制资本刍议》，登在反省院半月刊上。这篇文章引起了托洛茨基派的愤怒，他们说我反对托洛茨基，放弃了原来的立场，是叛徒，尤其是陈独秀对这件事很恼火。1937年4月，我被反省院释放出来后，就去了上海。

1938年，我离开上海去武昌找到了陈独秀。他开始对我很客气，问我怎么离开上海的。我说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他说：“啊，没有吃的！”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线。那时，我生活没有着落，日本人已经打到九江，在武昌不能再待下去。我便通过关系去找三民主义青年团，并随他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开始在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当科员，但我并没有履行入团手续，康泽知道我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派人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马上办手续。其实，我心里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去找谭平山。他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我过去曾替谭平山写过文章，以他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他对我的经济上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在重庆家里住了一二个月。我一家五口人（夫妻、两个孩子、父亲）吃饭，生活很困难，想找个工作。因此，我就写信给西安的梁干乔，问他是否可在西安为我找到工作。他回信说，在西安可以找到工作。这样，我一家离开重庆到了

西安。梁把我介绍到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战干四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在那里教历史。过了一段时间，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启免了我的职。我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宣介绍，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部下有个秘书叫徐先麟，他在军队中筹集了一笔款子，准备在上海办个刊物，要我去当这个刊物的总编辑。我表示愿意去，他们就把我家从西安迁到上海。到上海后，由于徐先麟给编辑的待遇不高。因此，我只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辞了职，靠写稿和翻译资料维持生活。在上海，我还在国民党的《民主与统一》刊物当过主编，但只办了几期就停办了。以后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前线日报》的总主笔是钱纳水，《时事新报晚刊》的总主笔是胡鄂公。胡鄂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京《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我，要我去南京给他帮忙。陶希圣是我在北大的同学，他知道我是托派。我接到他的信后，就趁这个机会把《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的工作辞掉了，于1948年7月来到南京。陶希圣把我安排在南京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以后又把我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那里。邓文仪把我派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后来我辞职回到上海，靠亲友的帮助维持生活，直至1949年10月全国解放。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期

刘仁静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革命逐渐和世界革命联成一气。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与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①列宁所说的亿万人民的觉醒、奋起和斗争，就是二十世纪初奔腾在亚洲大陆上的历史潮流，恰恰是在这股潮流初起时，我呱呱堕地，其后又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中进入了社会。

1902年，当古老的中国睡眼惺忪，将醒未醒之际，我诞生于湖北应城；辛亥革命后，当觉醒的人民再接再厉、上下求索报国之道时，我刚刚睁开好奇的眼睛，开始积累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给我的最初印象；新文化运动以来，当德赛两先生冲破重重障碍初访中国时，我心智初开，在这股清新的空气里初步形成自己的思想，可以说，中国人民在西方威胁与北方革命的激励下重新摸索自己道路的时期，恰恰是我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我的成长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发展。从这个意义看，我青少年时期的道

①《列宁全集》19卷68页。

路，也可以算是中国人民“由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斗争”^①的一个小小旁证。

在我少年时期，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没有通过什么戏剧性的事件给我以直接影响。惊动一时的辛亥革命，尽管发生在离我家乡不远的武昌，但除了革掉我头上的一根辫子外，并未能在我的脑中留下多少痕迹。在那时发生的种种变化中，我父亲最关切的要算是废科举、兴学堂了；对他这个以教书为生的穷秀才来说，这变化意味着教人背“四书”这碗饭已经不大容易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不要求我再学好八股文，却转而希望我学会洋文，以便将来能到邮局、海关之类的地方去找个金饭碗。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反映到我的家庭，反映到对我的教育上。我想，如果我不是通过这种形式接受了社会变动，在其后新旧思想大搏斗时，我——一个穷秀才的儿子——也不会那么自然而然地站在新思想一边。

就我本人来说，那时我也以在少年时期所特有的幼稚方式，浮光掠影地从时代潮流中摄取了自己的一份。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不像一般十来岁的孩子那样贪玩好动，可以一坐半天，埋头翻弄家里的一本破旧的《皇朝经世主编》，读些洋务派薛福成等人的文章，或者读一些《民报》、《新民丛报》上的时论，甚至连章太炎的古奥文章，我不管懂不懂，也能硬着头皮往下读。现在很难说这对我思想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不过，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孕育的感情常常会有些说不清的作用。至少其后我面对着对垒的新旧两军时，就很自然地觉得那些维新

①《列宁全集》18卷395页

派、革命派的名字或言论要熟悉些、亲切些。也许可以说，我在少年时睁眼看世界，虽然未能看清，但却模模糊糊为其中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这就为我以后力求追赶时代潮流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在一个潮流稍稍波及的小县城里渡过的。1914年，我和千千万万开始步入社会的少年一样，乘着逐渐高涨的历史潮流，带着当时一般少年所共有的单纯要求和模糊倾向，离开家乡到武昌去读中学，并由之走向我的青年时代。

我先到武昌博文书院读书。这是一个教会办的提倡读死书的学校，我在这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地读了两年，学到一些英语。1916年，由于无法继续取得亲戚的资助，交不起昂贵的学膳费，不得不转到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就读。对于我来说，在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在我即将进入青年时期时，脱离那死气沉沉的环境，转到一个能比较容易吸收新鲜空气的地方，这无疑是很幸运的。

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座落在粮道街，大学和附中在一个校园内，学校不大，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和出名的教授，是一所很普通的大学。校长陈时（叔澄）是个不到30岁的有钱公子，他出钱办教育，为的是沽名钓誉，捞取政治活动资本。后来这位年青的大学校长，在竞选省议员时，被人控告他虚报年龄（当时当议员有年龄限制），可惜我不记得这场官司是怎样了结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博文书院转到有某种自由研究空气的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对我的成长是有益的。正是在这段时期，我开始接触社会，接触各种思想，从